

衰落的西方需要“叫醒电话”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在中国，很多人可能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在奥运前夕西方持续鼓吹中国的人权记录有问题。实际上，对此没有必要感到困惑，原因很简单。一个受伤的西方文明被中国的崛起深深困扰了，一场成功的奥运会正是这种崛起的象征。人权是唯一一个让西方感到自己仍领先于世界的领域，只要西方感到它需要展示自己这种持续的优越性，它就会打出这张人权王牌。一旦中国懂得了西方焦虑的根源，它就可以平静地回应西方大声的鼓噪。

为什么说西方是一个受伤的文明？在过去 200 年里，由于它在很多领域中的超凡能力，西方得以主宰世界历史。这使西方还可以将世界大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我在印度的 3 亿祖先可以被 10 万英国人和平地统治。在英国的强迫下，中国在 1842 年接受了鸦片，并向英国出售茶叶。而现在，西方主宰历史的时代结束了。

更糟糕的是，在很多领域，西方长久以来保持竞争力的各项记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无能记录所取代，这包括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和金融。逐渐增多的无能记录又导致了在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乐观主义文化在今后逐渐被悲观主义取代。一次成功的由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无疑会加剧西方的悲观主义。

西方无能的例子太多了，以至于无法一一陈述。在地缘政治战线上，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和北约眼睁睁地等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降临。16 万美国军队不能使伊拉克这个仅有 2800 万人口的国家实现和平。毫无疑问，西方的军事力量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西方的领导人已经丧失了思考和应对的战略能力。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在政治战线上，西方看起来没有任何出色的领导人。乔治·W·布什的支持率是最低的之一。戈登·布朗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教科书上的范例，告诉你当你当选首相的时候不要做什么。同时，欧盟在修改欧盟宪法的问题上深陷泥沼。欧盟两次尝试加强中央决策的能力，也失败了两次。当欧盟仍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宪法修改时，它还面临着来自于周边的挑战：在北非和中东，在巴尔干和高加索。所有这些已经造成了欧洲人深深的不安全感。

在金融战线上，次贷危机带来的美国和欧洲银行的领导地位的垮台同样让人吃惊。当一些显然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获得贷款时，还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次贷债券中，这种无能可以说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正是那些像花旗和瑞士银行这样的蓝筹股银行做了这样的投资。此外，艾伦·格林斯潘曾经因为保持经济长期增长而被推崇为经济大师，但现在在美国他被广泛斥责，因为他允许房产泡沫过分膨胀，一旦它破裂，将使美国经济一团糟。更糟糕的是，世界两家最大的金融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深陷次贷危机，并接受美国纳税人的资金救助。将获利私有化并将企业风险均摊给社会，美国人正在违反他们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纳税人不应该向失败的资本家提供资金援助，这个原则是构成美国好的政府治理的核心。

一个小故事也许可以说明西方一些管理者已经变得多么无能。最近，一个主要的瑞士银行来到印度申请银行执照。这个瑞士银行家问道，获得一个印度的银行执照都有什么要求。印度监管人说，一个外国银行需要在印度有一个很好的银行监管人。一听到这个，瑞士银行家微笑着说：“我们在瑞士有最好的银行监管人。”而印度监管人却回答说：“我们对此并不确定，尤其是看到了美国监管人在贝尔斯登银行的失败，英国监管人在北岩银行的失败，法国监管人在法国兴业银行以及瑞士监管人在瑞士银行的失败以后。最好的监管人曾在西方，但现在不是了。”

唯一一个西方相信自己仍可以设定标准的领域就是人权问题。确实，在国内治理上，西方国家的居民享受到了人权保护。西方社会确实提供了一个模式，足以让其他社会将之视为追求目标。但是，这种高质量的国内记录并没有自动给予西方合法性，让他们对其他社会，包括中国，做出判决。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西方的人权记录已经出现了深深的缺陷。在人权领域，人类做出过两次跳跃

性的进步——废除奴隶制和进步性地使酷刑非法化。十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第一个将酷刑拷打重新带回来的现代发达国家将是自由和民主的灯塔——美国，我会说这不可能。但不可能已经发生。由于使用酷刑，美国已经丢掉了评论其他国家人权记录的道德权威。更糟的是，很多欧洲国家悄悄地同美国合谋运送犯人以供审讯。因此，在美国和欧洲可以对其其他国家的人权记录给出判决之前，他们应该先将自己清理干净。一个犯了罪的法官没有继续作法官的道德权威。

第二，西方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实现了国内高质量的人权记录。美国在 1776 年获得独立的时候宣称人的平等，但是此后这花费了美国几乎 100 年的时间去废除奴隶制，150 年来给予美国妇女投票的权利，200 年来给予黑人有效的投票权。因此，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用了 50 年就获得了同样程度的民主，这仍比美国的记录快得多。

第三，现今的一代西方公民并没有为获得他们的人权而奋斗。他们仅仅是在享受前几代人奋斗的成果。因此，如今的一代西方公民并不理解那些正在为获得相同权利而奋斗的人。西方公民也不理解中国在很多领域，比如食品、住房、教育和就业方面个人自由取得的扩展。在亚洲，自由正在不断增加，但是西方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

造成这种扭曲的最主要的人就是西方记者。很多人心里想的是前几代西方思想家拥护的伟大的想法。正因为他们心怀这样伟大的想法，这些西方记者自动地假设他们也同样拥有伟大的思想。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那么伟大，他们只是鹦鹉学舌一样重复过去那些伟大的真理，却并没有试着去理解一下，这些伟大的想法应该怎样被运用，以用来解释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尽管西方文明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是低估西方将是一个错误。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恢复力，西方不会成长得像今天一样强大。因此，西方还可以反弹回来。我写了新书《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试图给西方一个“叫醒电话”，告诉他们，为何现在西方创造了更多的全球问题而不是解决了这些问题。

历史上，西方社会是最开放的社会之一。他们超过了亚洲社会正是因为他们对世界的开放。自相矛盾的是，当西方应该将思想面向一个新的现实开放时，他们却变得封闭了。因此西方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向一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迈进，从一个由西方主宰的单一文明的世界迈向一个多文明的世界。我们和西方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告诉西方一个新的全球现实。但是我们不能进一步鼓励西方的仇外情绪。我们传递给西方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记住你自己是如何通过对世界的开放而变得强大的。现在是全面实践这个优点，并承认西方必须适应亚洲回归的时候了。▲（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著有《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本文由查雯翻译。）